

# 清史史料学初稿

冯尔康 著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焦静宜  
封面装帧 李 木

## 清史史科学初稿

冯尔康 著

---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 
(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)  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
天津宝坻牛家牌印刷厂印刷

---

1986年2月第1版	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开本: 850×1168 1/32	印张: 11.25 插页2
字数: 282千	印数: 3,500
统一书号: 11301·13	定价: 2.00元

# 目 录

<b>第一章 绪论</b> .....	(1)
第一节 清代历史地位和加强清史研究的意义.....	(1)
第二节 历史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.....	(4)
第三节 清朝修史制度与史料之丰富.....	(8)
第四节 清史史料学的任务.....	(17)
第五节 本书写作目的、内容和叙述方法.....	(23)
<b>第二章 编年体、纪传体清代通史史料</b> .....	(25)
第一节 清历朝起居注.....	(25)
第二节 清代历朝实录.....	(31)
第三节 东华录.....	(39)
第四节 清史稿.....	(42)
第五节 其他编年体、纪传体有关清史的史料.....	(52)
附 民国初年清代编年体史书.....	(55)
<b>第三章 政书体史料</b> .....	(57)
第一节 通制类的清三通、清会典.....	(59)
第二节 铨选与科举类史料.....	(66)
第三节 军机处和军政类史料.....	(68)
第四节 法律类史料.....	(71)
第五节 财政类史料.....	(75)
第六节 礼制类史料.....	(78)
第七节 诏令奏议类政书资料.....	(82)
第八节 关于政书的工具书.....	(86)

<b>第四章 档案史料</b> .....	( 89 )
第一节 内阁大库档案史料的发现和“一史馆” 对清代档案的搜集、保管.....	( 90 )
第二节 “一史馆”档案的史料价值及整理.....	( 95 )
第三节 “一史馆”以外的清代档案史料.....	(108)
第四节 档案史料的利用方法.....	(115)
<b>第五章 地方史志史料</b> .....	(120)
第一节 地方史志的名称和种类.....	(120)
第二节 清代地方史志的修纂.....	(122)
第三节 方志体裁.....	(130)
第四节 方志的史料价值.....	(133)
第五节 方志的收藏和利用.....	(136)
第六节 清人边疆史地著述.....	(142)
<b>第六章 文集史料</b> .....	(150)
第一节 文集的撰著与体裁.....	(150)
第二节 文集的史料价值.....	(157)
第三节 文集的阅读与利用.....	(175)
<b>第七章 谱牒史料</b> .....	(180)
第一节 现代学者开始重视谱牒史料.....	(180)
第二节 有关清史的宗谱的修纂.....	(184)
第三节 宗谱体例.....	(189)
第四节 史料价值.....	(193)
第五节 家谱举例.....	(198)
第六节 谱牒的利用.....	(203)
附 家训及其他有关载籍的史料.....	(207)
<b>第八章 传记史料</b> .....	(211)
第一节 人物传记史料的体裁及修纂.....	(211)
第二节 关于清史的主要传记图书及其史料价值.....	(217)

第三节	传记史料的利用·····	(226)
第四节	日记史料·····	(229)
第五节	书信史料·····	(233)
<b>第九章</b>	<b>笔记资料</b> ·····	(237)
第一节	笔记体图籍及其成为史料学研究对象·····	(237)
第二节	清人笔记及其史料价值·····	(240)
第三节	笔记的出版、研究与利用·····	(254)
<b>第十章</b>	<b>纪事本末体史料</b> ·····	(260)
第一节	方略和专题著作的史料·····	(260)
第二节	圣武记·····	(267)
<b>第十一章</b>	<b>契据、语录等体裁文献的史料</b> ·····	(271)
第一节	契据文书史料·····	(271)
第二节	语录和谚语史料·····	(278)
第三节	诗话史料·····	(287)
第四节	诗词、小说、书画、戏曲及宝卷史料·····	(291)
第五节	关于清史的演义·····	(298)
第六节	外国人记载的清史史料·····	(300)
<b>第十二章</b>	<b>有关清史类书、丛书和图书目录</b> ·····	(309)
第一节	类书史料·····	(309)
第二节	丛书史料·····	(316)
第三节	图书目录·····	(323)
附录一	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·····	(328)
附录二	清代档案史料书刊目录·····	(347)
<b>后 记</b>	·····	(354)

# 第一章 绪 论

什么是清史史料学，于今尚无专论，自然谈不到定论了。陈高华、陈志超等同志认为，史料学有两类：“一类研究搜集、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，可称为史料学通论；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、价值和利用，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”<sup>①</sup>。如按此分类，笔者的《清史史料学初稿》自必属于后一类型，是专门论述一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史料学的。但是，我以为“史料学通论”与“具体史料学”研究的问题是不能截然分开的，所以首先在本章讨论史料学、特别是有关清史史料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。

## 第一节 清代历史地位和 加强清史研究的意义

清史，作为断代史来讲，始于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的统治，终于宣统为辛亥革命所推翻，历经二百六十八年。清朝入关以前，努尔哈赤、皇太极父子统一满洲，反对明朝的开国史，与清史有密不可分的关联。溥仪在辛亥革命后，被冯玉祥驱逐出故宫以前的历史，也同清史有关。我们说的清史，系指清朝对全国统治时期的历史。倘若广义言之，就需要包括在东北的开国时期和在故宫的小朝廷时期的历史。因此清史史料学研究的时间范围，亦

<sup>①</sup> 《中国古代史史料学·前言》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—2页。

应同清史的概念相一致。

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，无论是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历史进程去观察，或从同时代世界历史的变化去分析，我们都可以发现清朝具有不同于以往各朝的特征。

一、清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时期。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、巩固，经过了几千年的历程，各个朝代的历史情况相异，对国家的统一、发展、巩固所起的作用和贡献也有不同。汉、唐、元、明、清五朝贡献较多，作用较大，其中尤以清朝为著。它以少数民族统一全国，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融合，巩固和增进了各民族经济、文化的联系、发展，稳定与加强了边疆的统治，奠定了牢固的疆域，实现了我国进一步统一、发展和巩固的历史任务，至今仍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栖息、建设的广阔土壤。

二、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与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。如以鸦片战争为界标，清代可划作前后两个时期<sup>①</sup>。在其前期，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已缓慢发展，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对社会矛盾尚能作局部调整，仍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。但这时的西方有一些国家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，进行了产业革命，疯狂地向外殖民，中国成了它们的侵略对象。只是前期的清朝政府，坚持与殖民主义者斗争，保持住了国家的独立；清后期则日益腐朽，被侵略者的炮舰政策轰开了大门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、半封建国家。这样巨大的社会变化，决非偶然，说明整个清代中国封制度已濒于衰落时期。

三、清代是文化上有所成就的时期。清代在文学、哲学、史学、地理学、民族学、数学、天文学、建筑学、医药学和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新的成就，产生了大量的我们引为民族骄傲的传世之

<sup>①</sup> 我把清代分为三个阶段，即：顺康雍的初期、乾嘉道（道光前二十年）的中期，鸦片战争后的七十年为后期。为行文方便，初中两期我又合称为前期。

作，如曹雪芹的小说《红楼梦》；也出现了诸如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顾炎武等著明的思想家。

李一氓同志曾说：“在史籍整理与历史研究上，我以为更应该着重清史”<sup>①</sup>。这是很有见地之论，处于中国古代和近代交替时期的清代史，距离今天只有七十多年的时间，它那个时代的一些物质的、精神的东西，仍然存在着或变形地存在着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现实生活。因此，研究这个时代对于理论和现实有着双重意义：即不仅有利于说明中国的过去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，更有利于认识现实，改造现实。说得具体一点，就是：

第一、了解清代历史上的成就，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及其失败教训，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。

第二、了解清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状况和特点，以便批判和肃清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，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上层建筑。

第三、了解清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风俗习惯，以便进一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进一步改变人民精神面貌，发展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，建立五讲四美的文明社会。

第四、了解清代民族关系和清政府的民族政策，以利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。

第五、了解清朝同世界各国关系史，以便从现状和历史两方面实际出发，发展对外事务，以自立于世界之林。

第六、加强清史研究，也是建设科学的清朝断代史的需要。在断代史研究中，清史是新的部门，异常薄弱，空白点太多，同它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，需要加强建设。同时后代、隔代为前代修史，是中国史学的良好传统。关于清朝一代的历史，大部头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李一氓：《再论古籍和古籍整理》见《解放日报》1983年5月4日。



只有民国前期编纂的《清史稿》，但尚不足为一代信史，即此一端，可见加强清史研究的必要性了。

研究清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表明加强这门学科建设的迫切性，而历史研究必先从整理史料着手，这就引出下面将要叙述的问题。

## 第二节 历史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

马克思深刻地指出：“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，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，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。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，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”<sup>①</sup>。笔者认为详细地、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，分析材料，从中得出客观事实所固有的结论，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，科学的方法，而占有资料是这个方法的必要组成部分，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

搜集资料是调查研究的方法，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方法。存在决定意识，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，来源于实践，历史资料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记录，人们要了解历史，说明人类的历史实践，必须向历史资料作调查，调查得越充分，掌握的资料越多，就越能恢复历史的原貌。比如人们对《尚书》就有一个搜集资料加深认识的过程，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，《尚书》失传了，西汉初年根据伏生的记忆，录出《尚书》（即《今文尚书》）。至汉武帝末年，相传在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古本《尚书》，加之东晋梅颐献伪《古文尚书》，与伏生口授的不同，后遂形成经今古文之争，促进了对《尚书》等古籍及思想史的研究。孔壁藏书的发现，起了增加史料的作用。又如满洲与明朝关系问题，由于清

<sup>①</sup> 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二版跋，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，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卷首22页。

朝统治全国后，隐讳满洲曾臣服于明朝的事实，将大量资料焚毁，至使记载明朝一代历史的《明史》就极其缺乏这方面的资料。因此只根据比较容易搜集的资料，就很难说明这一问题。不满足这一状况的史学家，想方设法扩大资料来源，谋求占有更多的史料。对明清史研究做出杰出贡献的孟森、吴晗都从朝鲜人的史书《李朝实录》搜集有关资料。在三十年代前期，北京只有北平图书馆藏有一部《李朝实录》，年逾古稀的孟森每天步行去阅读，另一位青年学者吴晗也是风雨无阻，去翻阅同一部著作<sup>①</sup>，这一老一少从中获得大量的满洲开国史的资料，又同中国史料相结合、比勘，孟森借以形成他的《明元清系通纪》一书，吴晗写出《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》论文<sup>②</sup>，并辑成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资料集。

吴晗为着便利明史的研究，也为着有利于搞清满洲与明朝关系史，积极主张和出版了不易见到的陈子龙等人编辑的《明经世文编》。可见真想解决历史问题的，有成就的史学家，无不着力于调查研究，千方百计扩大资料来源，更多地占有史料。再如同治之死，向有亡于性病之说，光绪之死，久有为慈禧所害的怀疑，这一类宫闈之谜，很难澄清。近年档案资料研究者与中医学家相结合，把现存的同治、光绪就疹的《脉案》档案当作历史资料，进行研究，得出同治死于天花，光绪死于肺病的结论。这些观点是否成立，能否为学术界所公认，尚有待进一步证实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至少他们提出了问题，推动了研究的深入。这些扩展史料来源所取得的成果，同样表现了详细占有资料的思想和方法的意义。

① 参阅郑天挺：《探微集·有学力、有能力、有魄力、有魄力的历史学家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453页。

② 原题名《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》，收入《读史札记》，三联书店1981年版。

详细地、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，才能对资料本身作去伪存真，去粗取精、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的分析，揭示历史的真象。某一种史料，只能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的某一侧面，或某种表象，据此而得出的结论，很难反映历史的本质。有的史料作者写作态度不严肃，记事有失实之处，还有的作者故意伪造历史，有的不同载籍的资料互相牴牾，所有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详加调查，以便进行史料鉴别，去伪存真，避免上当。比如李渊太原起兵，《旧唐书》的《高祖本纪》记唐太宗首先倡议举兵反隋，化家为国。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唐史主要典籍，也作同样记载，这都突出了唐太宗的作用，抹煞了李渊及太子李建成的作为。而不常见的早于这些著作的温大雅的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，则记李渊早有起兵谋虑，举兵后李建成与李世民同样建立功业，据此可知太原起兵，李渊主谋，李建成与唐太宗辅之。对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与“两唐书”、“通鉴”的矛盾记载，需做认真分析，辨别出反映历史实际的资料。对这类有差异的文献，如果不以详细占有史料的态度来对待，很可能因“两唐书”、“通鉴”为名著，也就满足于它们所提供的资料了，而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知道的人少，书也不好找，没有详细占有史料的态度也就难于千方百计去寻找了。所以详细占有资料既是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，也是研究态度问题。

详细地、全面地占有资料，才可能克服历史唯心论和形而上学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，随心所欲，有了一点资料，就可以得出“结论”，或形成什么史学体系，然而却是不反映历史实际的，是非科学的、无益的，甚至是反动的。史学界有些问题的讨论，未能取得一致的或接近一致的认识，原因之一，是没有全面占有资料，大家都根据那几条史料，用来用去，好象炒米饭一样，用的佐料不同，名称不同，但做出来的还是米饭。没有提高到新境界，也就没有解决问题。比如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问

题，常用的资料就是《明神宗实录》关于苏州织工的记录，张瀚在《松窗梦语》中关于他的先人发家史的叙述，徐一夔《织工对》关于杭州织工的描写，冯梦龙《醒世恒言》中施复发家的故事。如果凭着这点资料，只能把观点悬在起初提出的水平上，很难深入下去。又如关于清代秘密结社的文献，屡言会首劝人入会，交纳会金，许以将来给官给田，并把这种会费名为“种福钱”、“根基钱”。有的研究者谓之为预言给农民平分土地。时至今日，秘密结社史的研究处于开展不力的状态，关于它的资料虽然在个别问题上有了搜集，但还很不完备，因此那种均田说至多只能是一种假设，而不能作为定论。

详细地、全面地占有史料，是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，也是史学工作者的实践。史学研究者搜集材料，伴之以鉴别，继续发现新资料，继续加以审定，再一次扩大资料，又一次进行评论，这样不断积累史料，反复进行研究，不断修改意见，最后得出结论，这个持续研究的过程，也是史学家不断实践的过程。实践出真知，实践中改正错误观点，争取获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。实践，就是付出劳动，就不能怕艰苦，怕麻烦。孟森、吴晗以这种精神去查阅资料，才取得优异的成绩。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也是这样的学者，他为史坛贡献出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、《清开国史料考》、《明清笔记谈丛》、《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》、《南明史略》、《明末清初的学风》、《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》、《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》等大量著作。特别是史籍考订和资料汇集，为后学提供很多方便，他能有如此成就，原因之一就是勤于访书，勤于阅读和抄录。史学工作者从他的身上，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详细占有资料的有益启示。

### 第三节 清朝修史制度与史料之丰富

清史的资料书，有清朝人编纂的，也有清亡后史家撰写的，不过清人撰著的占主要成分。这里主要说明清朝政府的修史制度和史书的写作。

清朝政府和士人注意编写史书，这有它的客观需要和充足条件。清朝统治者努力吸收前人统治经验，弥补其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文化低、经验不足的缺陷；它对汉人一方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，一方面又要充分利用，因而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同时，又鼓励士人按照它的要求从事文化建设，其中重要一项是编修史书；汉族士人在参加政治活动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下，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，着力著述；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国家的统一，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，要求文化的相应发展，其中包括历史学的发展，以巩固其经济基础和政权建设上的成就。经济的发展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，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物质条件，政权的提倡更起了保证作用。正是在这需要和条件相结合的情况下，出现了清代比较繁荣的历史编纂学。

清朝政府自建立政权起，就开始了修史工作，努尔哈赤设文馆，召通晓满汉文的达海入直，命翻译《明会典》、《素书》、《三略》等书。皇太极继位之初，就于天聪二年（1628年）命文馆分办两方面事务：由达海、刚林等译汉文书籍，当时着手翻译的有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大乘经》等书；命库尔缠等“记注国政”<sup>①</sup>。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，改文馆为内三院，即国史、秘书、弘文三院，“编纂国史、收藏书籍”<sup>②</sup>。清朝开国二帝着重翻译汉文史书、政书，同时着手清朝历史资料的积累和保管。

① 《清史列传》卷4《达海传》；《清史稿》卷228《达海传》。

② 《清史稿》卷145《艺文志》。

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，即入关后的第二年，清朝就设立明史馆，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銓、洪承畴、范文程、刚林等人充总裁官，修明史，然限于当时国家初建的不安定环境，未能开展工作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开博学宏词专科，取士五十人，命学士徐元文、叶方霁为明史总裁，率领大部分中试者撰写明史。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命侍读王鸿绪为总裁官，藉万斯同等之力，成《明史稿》。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又以张廷玉为总裁，至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终于修成三百三十二卷的《明史》。此书修纂长达九十五年，是中国官修史书历时最久的一部。此书编定用力甚勤，诚如张廷玉等《上明史表》所说：“搜图书于金石，罗耆俊于山林，创事编摩，宽其岁月”<sup>①</sup>。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同年令编写《元史》，是后一王朝替前朝修史最早的，清朝在明亡的第二年着手写《明史》，是次早的。《明史》的撰修过程和特点，表明清朝为吸取统治经验而高度重视历史编纂学<sup>②</sup>。

清朝为修史，建立常设机构，主要有内廷三馆，即国史馆、方略馆和武英殿修书处。

国史馆，属翰林院，主要任务是纂写清朝历史。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设“三朝国史馆”，编写清太祖、太宗、世祖前三朝的历史，书成，该馆即行撤消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复开史馆，撰修已过之五朝（前三朝加康熙、雍正两朝）历史，十四年（1749）竣功，史馆亦行裁撤。三十年（1765）为写国史列传，再设国史馆，自此遂为常设机构<sup>③</sup>，直至清朝灭亡。国史馆下设若干机构，不同时期亦有所变化，道光以前，设有翻译股、纂修股，满纂修房、汉纂修房、书库。光绪、宣统年间，设有承发房、长编处、奏议处、文移处、蒙古表传处、十四志处、四传处、画一传

① 《明史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28册，8630页。

② 业师郑天挺先生讲过《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》，本处吸收了他的观点。

③ 光绪《大清会典事例》卷1049《翰林院》。

处、大臣传处、满堂、蒙古堂、书库、帑库等。国史馆官员有总裁、副总裁，从大学士、六部堂官中简任，没有定员；有提调官，满、蒙、汉各二人，从侍读学士、侍读中派充；总纂满洲四人、蒙古二人、汉六人，纂修、协修满蒙汉各若干人，由侍读学士、侍读、编修、检讨中选派，清文总校一人，满洲侍郎内特简；校对满蒙汉各八人，从内阁中书中派任；光绪间增置笔削员十人<sup>①</sup>。国史馆修书，完成了许多半成品和成品，撰写了若干帝王本纪、大臣传记、传记长编，大一统志，积累了很多素材，现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就有四万二千多册<sup>②</sup>。

方略馆，属军机处，撰著清朝发生的战争专史。康熙时起，每当一次战争结束，或者遇有重大政事，皇帝命令设专馆修书，备记其始末，名曰“方略”或“纪略”，书成由皇帝审定，所以说是“勅修”、“钦定”。方略馆设“总裁”，由大学士或军机大臣兼任，另设提调、收掌、纂修、校对诸职。方略馆系有事时开设，事毕即行撤销，但因屡修方略，使它等于常设机构<sup>③</sup>。

武英殿修书处，属内务府，负责修书和刊刻图籍。武英殿修书处总裁，满汉各一，由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内简任，下设提调、纂修、协修、笔帖式<sup>④</sup>。武英殿印书很多，乾隆中校刊“十三经”、“二十二史”，清朝修的政书、方略，皇帝的诗文集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等。它所印制的书称为“殿版”、“聚珍版”。

内廷三馆以外，还有一些常设的修书机构，重要的有起居注馆，属翰林院，内设日讲起居注官，满洲十人，汉十二人，由翰林院、詹事府各官简用，满汉翰林院掌院学士各兼一缺，主事、满洲二人，汉一人，以科甲出身官员充任；笔帖式，满洲十四

① 光绪《大清会典》卷70；《清史稿》卷115《职官志》。

② 参阅李鹏年：《国史馆及其档案》，载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1年第三期。

③ 光绪《大清会典》卷3《军机处》，《清史稿》卷114《职官志》。

④ 光绪《大清会典》卷98《内务府》；《清史稿》卷118《职官志》。

人、汉军二人。起居注官侍从皇帝，记录其言论行动，成历朝起居注<sup>①</sup>。有玉牒馆，隶属于宗人府，掌修《宗室玉牒》和《星源吉庆》。修玉牒时，特设总裁，修纂等官主持其事。正副总裁官，由皇帝从宗人府宗令、宗正和满汉大学士，礼部尚书、侍郎、内阁学士中点任，用大学士一人颁催，以宗人府丞担任管校官，以府属理事官、满汉主事、内阁侍读、翰林院官及礼部司官任纂修官。书修成功，皇帝阅后，奖励与事人员<sup>②</sup>。可见皇帝的重视。

清朝临时性的修书机关更多，是一些“奉旨特开之馆”，事竣即行裁撤。其中著名的有蒙养斋馆。康熙后期，命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其事，馆设于内廷蒙养斋，故名。允祉召集名学者陈梦雷、方苞等人参加工作，派人在京城及广东、云南等七省进行天象观测，撰成《律吕正义》、《历象考成》、《数理精蕴》三书，康熙赐名《律历渊源》，为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音乐方面专著。允祉等又从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编辑工作，至雍正时成书。

四库全书馆，乾隆后期开设，辑成我国最大的丛书《四库全书》，同时对古籍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清理，虽然由于政治原因，毁坏了一批珍贵图书，但整理和保存载籍，仍有其积极意义。

三通馆，乾隆时设立，续修“前三通”，撰成“续三通”（《续通典》、《续通志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）和“清三通”（《清朝通典》、《清朝通志》、《清朝文献通考》）。

清朝还根据政府各部门的需要，编写专门载籍或工作条例，如中央修“会典”，“一统志”，各衙门定“则例”、地方上编方志等等。

清朝政府有时特命编纂一些书籍，如康熙时修成《康熙字典》、《佩文韵府》、《渊鉴类函》、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。这类图籍虽不是史

① 《清史稿》卷115《职官志》。

② 光绪《大清会典》卷1《宗人府》；《清史稿》卷114《职官志》。



书，但对治史者并非完全没有参考价值。

一些官僚，也以政府的力量，进行图书的整理和出版，如刑部尚书徐乾学回原籍崑山闲居，康熙命一统志书局随从他工作，他延聘《读史方輿纪要》的作者顾祖禹和阎若璩、胡渭等人参与其事，所谓“一堂宾从之贤，皆九等人表之最”。<sup>①</sup>又如曾国藩倡设金陵、苏州、扬州、杭州、武昌官书局，张之洞设立广雅书局，“延聘儒雅，校刊群籍”<sup>②</sup>。

清朝政府经常进行本身历史的编纂，间亦从事前代史的编辑，这是事实，不必多叙。惟是梁启超以来，一些史家认为清代修史事业极不发达，或如史学史专家李宗侗所说：“清代以厉行文字狱之故，学者遂不敢研究明史及当代史，故清代史学家只最初有数人，季世有数人，中间只有历史考证学，而无纯粹史学家”<sup>③</sup>。清代史学家对当代史的著作，大部头的带有一定综述性的，仅有魏源的《圣武记》等少数几部书，不象宋人有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徐梦莘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李心传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；也不象明人，有何乔远的《名山藏》，朱国祜的《史概》，陈仁锡的《皇明世法录》，在这一方面，清代史家确实相形见绌，但是清人对具体的历史事件、人物、制度的叙述则是繁富的，而从今天保存下来的看，比历代都多得多。这就是说堪称为名著的少，而所保有的社会各方面的资料并非不丰富。清代始终存在的满汉矛盾，康熙雍正乾隆间的文字狱和毁禁书，一定程度影响了私人写作，但这主要是对从事满汉关系、政论的著述有阻挠作用，远没有影响到史学全体。说清代缺乏史著的观点，虽有一定道理，但没有反映清代史学的全貌。是否可以这样说，清代保持并发展了中国官修史书的传统，纂辑出实录、起居

① 陈康祺：《郎潜纪闻》卷3。

② 《清史稿》卷145《艺文志》。

③ 《中国史学史》，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印行，1979年版，163页。